



迄今为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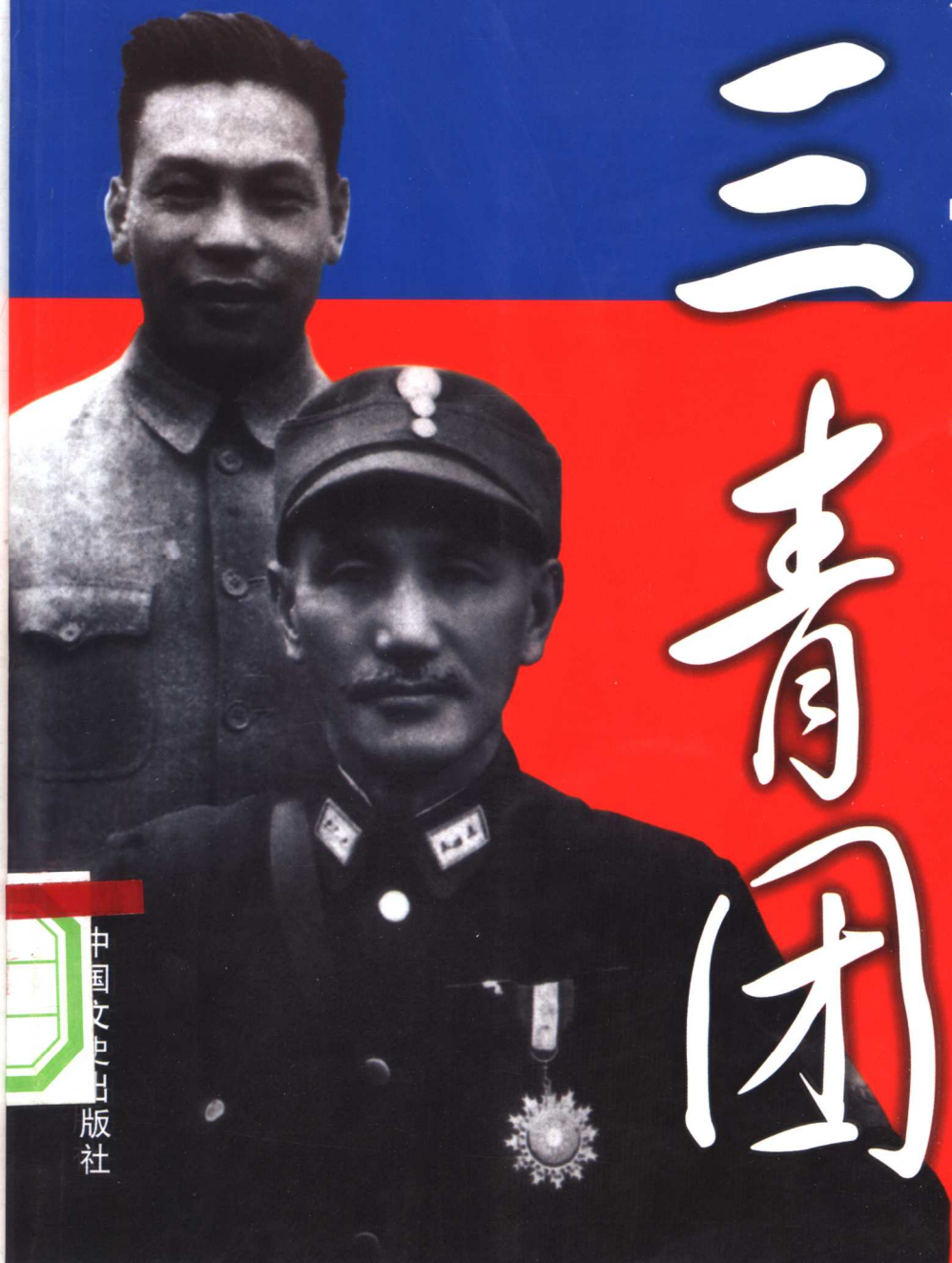
大陆第一部

完整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著述

蒋家父子与

三青团

马烈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蒋家父子与三青团

马 烈 著

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蒋家父子与三青团 / 马烈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7. 1

ISBN 978-7-5034-1866-2

I. 蒋... II. 马... III. ①蒋介石 (1887~1975) —生平事迹
②蒋经国 (1910~1988) —生平事迹 ③三青团 —史料
IV. ① K827 = 7 ② D693. 7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4225 号

责任编辑: 方 正 装帧设计: 水军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

印 装: 北京画中国画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: 100070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8.25 字数: 160 千字

印 数: 7000 册

版 次: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2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序

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张宪文

近20年来，史学界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势头，全方位、多层次、多视角的研究性论文与著作不断出现，不仅历史真相被越来越清晰地还原，而且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也越来越客观公允。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学者，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。

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自然是极为重要的内容，而在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中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历史也是相当重要的内容。目前，海内外已见到的有关中国国民党史的论著不在少数。但在这些著作中，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论述大多显得比较单薄、含蓄。而纯粹研究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论文与著作数量极少，就我所见到的，虽然不乏独到之处和精辟之见，但却感到立论与史料未能兼美，故不免有缺憾之叹。

马烈教授多年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科研，尤致力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，与我所在的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多有合作。他治学严谨，成果颇丰。现在，放在我案头的这本《蒋家父子与三青团》书稿，就是他历时十余年耕耘而收获的又一成果。马烈教授嘱我为该书写一序言，我欣然从命。综观此书，我觉得有几个特点是我比较赞赏的。

其一，史学著作首重史料，《蒋家父子与三青团》在史料方面可谓相当翔实。该书史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。一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。这些档案不仅提供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会议、组织、宣传等方面以及各种活动的史料，提供

了蒋介石、陈诚、张治中等人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，而且提供了大量准确的名单、数据，如各届干事会的名单、每年发展的团员数量、报名参加知识青年从军的人数，等等。二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和地方干部的回忆。这些口述史料不仅补充了档案史料的缺失，而且提供了大量生动具体的事例。陈立夫、张治中、康泽、程思远、何廉等中央团部的领导干部的回忆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团内的派系、党团矛盾、海外团部等情况；而摘自全国及各省市文史资料的当事人回忆，则展示了各地的具体活动与矛盾。三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有关史料，包括中共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关系及对策。

其二，史学研究力求论点要新颖、论述要客观、结论要公允，我觉得《蒋家父子与三青团》在这几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。蒋介石在抗战爆发之初热切地要求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，究竟出于什么动机，本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，确实值得重视和探讨。在论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、活动、内部的矛盾和斗争、与共产党及进步学生运动的关系等问题时，作者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，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正面和负面，进行了详细而客观的述论和分析，并因此得出对三民主义青年团比较公允恰当的结论——抗日与反共并重，前期与后期有异，上层与下层不一，动机与效果相反。

其三，该书在整体结构上，也是有其特色的。既有纵向的论述——按时间先后写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酝酿、成立、活动、合并，给读者一个清楚的来龙去脉，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；又有横向的论述——探讨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、共产党、学生运动之间的关系，陈述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团部的情况，介绍部分主要领导干部的历史及活动，使读者对其中错综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内容，有更为深入的了解。这样的论述结构，再加上大事年表和若干照片，一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史就完整地放在了读者的面前。

这是我在初看《蒋家父子与三青团》后的几点感觉，既未必全面，也未必完全正确。见仁见智，待书出版后，如果能在史学界产生反响和争论，那既是我的希望，我想也是马烈教授的愿望。

张宪文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专家，在国际上颇著声望，现担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、博士生导师。

目 录

第一章 蒋介石为什么要成立三青团 / 1

- 1 原始动机：合并中国共产党
- 11 两个次要意图
- 16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

第二章 三青团中央的派系和矛盾 / 25

- 25 纷繁复杂的派系
- 39 中央临时干事会的构成和特点
- 51 勾心斗角的矛盾和猜忌

第三章 蒋介石的厚望和三青团的发展 / 59

- 59 蒋介石对三青团的厚望
- 64 三青团团章和各级组织机构

- 76 三青团组织发展和团员总甄核

第四章 三青团对青年的训练 / 91

- 91 青干班和青干校
103 团员训练和青年夏令营
111 集中营式的战时青年训导团

第五章 三青团开展的主要活动 / 119

- 119 文化宣传和社会服务
126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
138 反贪污反官僚运动

第六章 形形色色的地方团部 / 153

- 153 地方势力对三青团的攘夺
159 地方团部亲蒋派内部斗争种种
162 一些独具特点的支团部

第七章 三青团与共产党及进步学生运动 / 171

- 171 共产党曾表示赞助三青团
179 三青团的反共活动
187 三青团与进步学生运动

第八章 蒋经国的崛起 / 205

- 205 从江西支团部主任到中央团部组训处长
- 214 蒋经国系的三大支柱
- 222 蒋经国系的活动与蒋经国的崛起

第九章 三青团与国民党 / 233

- 233 党团矛盾与始俱来
- 240 三青团独立建党的呼声
- 247 《团的改进》和党团合并

第十章 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整体评价 / 261

- 273 附录：三民主义青年团大事年表
- 284 主要参考书目和资料
- 287 后记

第一章

蒋介石为什么要成立三青团

原始动机：合并中国共产党

三民主义青年团（以下简称“三青团”）成立于1938年7月。这个组织完全是由蒋介石亲自构想设计、一手组建扶持起来的。蒋介石为什么要在抗战之初成立这样一个组织？三青团酝酿设计之初，是否就是如后来那样专为组训青年的一个组织？换言之，也就是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原始动机究竟是什么？这是研究和撰写三民主义青年团历史，所必须面对的第一个问题。

要弄清蒋介石组建三青团的原始动机，首先要弄清他建立这个组织的想法产生于何时。

三青团中央团部于1946年编印的《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》（上编）记载的是，民国“二十六年初”，即1937年初，蒋介石“决心创设三民主义青年团”¹。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，后兼三青团中央干事的何廉回忆说：“一九三七年暮春，我第一次听人说起委员长打算在国民党内再组织一个党。夏天，一个朋友告诉我，委员长真的打算组织这样一个政党，并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。”²根据这两件材料，大致可以认定，蒋介石建立一个新组织



抗战爆发前，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大组织，并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。这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。蒋介石（1887—1975），抗战时期任国民党总裁、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、三青团团长、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、国民政府主席等职。

康泽（1904—1967），复兴社重要成员，曾任蒋介石侍从参谋，深得蒋之信任。历任军委会别动队总队长、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、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兼组织处长。

的想法，肇始于1937年春。

不过，这时尚未明确新组织的名称。因为“三民主义青年团”这一名称，据说是1937年6月下旬，复兴社骨干分子贺衷寒于出国考察前，到庐山向蒋介石呈交复兴社改组计划时才提出来的。³所以，何廉在其回忆中说，1937年暮春，他只听说要组织一个党，但未提及名称，直到夏天，才听说这个党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。

其次，需要弄清的是三青团设计之初的构想，是否就是一个以组训青年为目的的组织。答案是否定的。

最早参与三青团的筹备工作、后来长期担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的康泽回忆说：大约在1937年10月，蒋介石召集陈立夫、刘健群和康泽谈话。蒋介石说：“现在抗战已经发生，这是全国的和长期的性



质……我们需要公开的、范围更大的组织，将来共产党也可以参加的。现在我们先党内力量统一起来，以党的（指CC系——作者按）、同学的（指复兴社——作者按）和改组派为基础，先组织起来，然后再吸引其余的……”⁴

在另一篇记述这次谈话的回忆文字中，康泽写道：“全国规模的抗战开始以后，蒋介石就想抓住这个时机，以‘团结抗战’为名……搞‘三民主义青年团’。”“他对我们说：‘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，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，要来一个大组织，把党部的（指CC系）、同学的（指复兴社）和改组派（指汪精卫）都团结起来；并以此为中心，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。’”⁵

两段文字大同小异，从中可以看出，蒋介石设想成立的大组织，即三民主义青年团，并不是一个用以组训青年的组织，而是要吸纳共产党和各党各派的组织，因为上述两段文字均未提及新组织应以团结和组训青年为宗旨。康泽被其同事称为“记忆力极强”的人，作为三青团最初少数几个筹备成员之一，其后又长期担任领导骨干，他不可能在回忆录中两次都忘记写上三青团是为组训青年而成立的。对此，唯一合理的解释是，康泽在三青团酝酿建立之时，就知道它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纯的青年组织而设计的。

综合康泽的两次回忆，不难发现，蒋介石成立三青团就是要以国民党内的“精英分子”为核心，吸收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，形成一个大组织；而就当时中国党派情况来看，首要的自然是把共产党吸收进来，也就是说，要通过三青团来合并共产党，达到溶共的目的。

那么，在1937年春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会使蒋介石产生建立新组织（三青团）的念头，会使他认为有合并共产党的可能性呢？

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，国共两党停止了内战，出现合作抗日的动向。1937年2月10日，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，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，以促成国共再次合作的实现。其四项保证中有如下之内容：“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”；“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，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，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”。⁶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一方面通过了《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》，一方面则又宣言要“和平统一”共产党，被迫放弃了“武装剿共”的方针，原则上同意了国共合作抗日。

国共两党对对方态度的转变，就是1937年春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态。而蒋

介石在当时既要信守西安事变中的诺言，不打内战，又要执行五届三中全会决议，“根绝赤祸”，因此只能在“和平统一”共产党方面设法另辟蹊径。

2月下旬至3月中旬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、贺衷寒、张冲，与中共代表周恩来、秦邦宪、叶剑英在西安谈判。国民党根据蒋介石“和平统一”共产党的方针，要求中共放弃自己的独立性，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；要求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，接受南京政府派遣的各级军政人员，完全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等。这种不平等的态度和过分的要求，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的拒绝，中共代表要求与蒋介石直接对话。

3月下旬至4月上旬，蒋介石在杭州与周恩来、潘汉年谈判。周恩来重申了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立场与诚意。他强调指出，中共是站在民族解放、民主自由、民生改善的奋斗目标上，拥护蒋介石统一和抗日的，同时提出了中共有关陕甘宁边区和红军的要求条件。

蒋介石在会谈中称赞中共“有民族意识、革命精神，是新生力量”，并“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，造成军阀割据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”的局面。他希望共产党能与他“永久合作”，即使他死后“也要不生分裂”。他要求周恩来拿出一个与他永久合作的办法来，要周恩来赶快起草一个共同纲领。⁷

杭州谈判中，国共双方姿态都比较高，因此，蒋介石对“和平统一”中共的前景十分乐观。但他知道，眼下“共产党的独立组织，不能改变”；“共产党的国际关系不能取消”；“共产党不会无条件的拥护他，而他又不能满足于党外合作”，⁸因此，在蒋介石要求中共拿出永久合作办法的同时，他自己也在寻找这样的办法。这个办法就是建立一个能融合国共两党的新组织，作为一步“缓冲”，以后再发展到两党合并。

蒋介石当然知道，艰苦持久的中日战争即将爆发，中国需要一个坚强而团结的领导核心，需要一大批忠贞而实干的干部。但他对国民党感到失望，不仅因为不少党员和干部的腐败，而且因为党内派系林立，他不能指挥裕如。而在1924—1927年的大革命中，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人共过事，亲眼见过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、实干精神。即使在1927年以后的国共内战中，他也了解共产党人对事业的忠贞不贰和不畏艰难困苦的精神。他当然希望把这样的人罗致到自己的麾下。他和宋美龄就曾因国民党内没有像周恩来这样出色的人才而遗憾。

另一方面，中共的高级领导人相当多数都曾是他的同事、部属、学生，从

西安事变以来，中共一再表明合作的诚意，使蒋介石认为实现上述希望存在着可能性。

蒋介石最早显然与他的智囊团政学系——由党派意识不太强烈的技术官僚构成——讨论过这个办法。所以，CC系首领陈立夫、复兴社书记长康泽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未提及，而政学系分子何廉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“一九三七年暮春”，他听朋友说，蒋介石打算在国民党内再组织一个党——这个时间，正是杭州谈判之后。

当然，这时关于这个党（或者说新组织）的构想，包括名称、范围、组织方法等都还是不明朗的，但基本思路似乎已经形成：即先党内，后党外；先以复兴社、CC系、改组派等青年分子，组成新组织的核心，然后扩及共产党，进而至其他党派和一般青年，以形成一个既忠于蒋介石，又充满朝气的新组织。这也就是蒋介石向周恩来强调“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，只是与他合作”的缘故。

周恩来从杭州返回延安，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谈判的情况，并根据书记处的意见拟定了几条建议。其主要内容有：在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的基础上结成新的民族联盟（或党），包括国共两党及赞成此纲领的各党派团体；同意推荐蒋介石为领袖；在陕甘宁边区和红军问题上如能满意解决，中共可以党的名义发表合作宣言。⁹ 5月下旬，周恩来到洛阳会见蒋介石，递交了上述建议，并约定双方下次会谈地点在江西庐山。中共上述建议无疑令蒋介石大为振奋。建议中的“统一的民族联盟”，恰与蒋介石所构思的新组织有暗合之处，而且这个民族联盟的最高领袖又非他莫属，中共甚至还提到了这个联盟有可能是个“党”。显然，蒋介石与他的智囊们仔细讨论过周恩来递交的这个建议，并制订了相应的方案，包括这个民族联盟的名称、组成、前景等。

当6月上旬，在庐山与周恩来再度会谈时，蒋介石撇开周恩来提交的《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》不谈，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他自己的方案：

（1）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，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，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，蒋为主席，有最后决定之权；

（2）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，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，然后执行；

（3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，将来视情况许可，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；

（4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，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。¹⁰

试分析蒋介石的上述方案，可以看出：一、所谓国民革命同盟会实际上是一个“党中之党”，它由国共两党的部分成员组成。在国民党方面，显然就是由复兴社、CC系和改组派等青年干练分子加入。这样，对何廉所回忆的“在国民党内再组一个党”这句话就好理解了。二、这个同盟会发展的前景是国共两党分子合组的政党。这才是蒋介石真实意图和最终目的所在——“和平统一”共产党。

对这个将要融合两党的新组织（新政党），1937年6月上旬，蒋介石把它命名为“国民革命同盟会”，而到了6月下旬，贺衷寒在呈文中提到的“三民主义青年团”这一名称，显然更合蒋介石的意。所以，何廉回忆说，当年夏天，“委员长真的打算组织这样一个政党，并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”。

因此，国民革命同盟会实际上是三青团的原始方案。它是1937年5月下旬，蒋介石收到周恩来递交的中共建议之后，与他的助手们制订的。所以，在三青团的团史资料上记载着：“（民国）二十六年五月，为本团实际筹备工作开始时期。”

庐山谈判后，周恩来带着蒋介石的方案返回延安。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蒋介石，表示原则上同意他提出的关于国民革命同盟会的意见。不久，卢沟桥事变发生，周恩来又代表中共，主动建议蒋介石迅速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，并提交了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》。该宣言郑重宣布：一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，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。二、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。三、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，实行民权政治，以期全国政权的统一。四、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，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。¹¹

中共的上述表态增加了蒋介石建立一个融合两党的大组织的信心。尤其是8月22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后，蒋介石也正式开始了组建三青团的操作过程。何廉回忆说：1937年“八月的一个雨天，我被召到委员长的军校官邸去见他。当我走进他的会客室时，发现陈立夫、吴鼎昌、何应钦、康泽等人也在场。委员长在这个正式会议上首次宣布，他将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。他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三青团成为一个机构，用来吸收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建设新中国基本原则的青年入团，并说他宣布这些不是为了听取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，而只是通知我们”。¹²

10月间，中秋节后的一天，正是“苏嘉国防线被敌军突破，首都形势紧张”之时，蒋介石“于警耗频传日理万机之际，在总理陵园，约集并指定本党有关重

要人员，对于成立本团各种计划，正式作初度商讨，嗣复每周集议，精极进行，迨南京撤守，领袖复于庐山牯岭，召集会议，同时加紧筹备组团工作”。¹³

据康泽回忆，从这次陵园官邸会议到12月6日蒋介石撤离南京为止，其间，每三天或一周就要开一次会，讨论三青团事宜。参加者，除蒋介石外，就是陈立夫、刘健群、康泽三人。关于这些会议的内容，只有康泽的回忆中有点滴记载。例如，在一次“谈到大组织名称问题”时，康泽、刘健群主张就用“三民主义青年团”，而陈立夫则主张要冠以“中国国民党”字样。蒋介石说：“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，人家就不来了。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，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。”¹⁴这段回忆正表明，蒋介石要让这个新组织超然于国民党之上，所谓的人家，正是与国民党相对而言，指的是共产党和其他党派。

然而，除了康泽这少许的回忆内容之外，关于这一个多月间会议的讨论，三青团团史资料上只空泛地提了一句：“对于成立本团各种计划”，进行商讨、集议。陈立夫在其回忆录《成败之鉴》中则只字未提。何以如此？原因就在于这些会议确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决定。而这又是与当时国共谈判密切相关的。从9月初至12月初，国共两党间的高层谈判暂时停顿。中共主要谈判代表周恩来这一时间基本上都在山西前线。国共两党高层谈判的暂停与三青团筹建工作的毫无进展，在时间上如此一致，自然绝非巧合。它恰恰从另一角度证明，建立三青团与“统一”共产党是同一件事——当蒋介石无法了解到共产党的想法时，他就无法为三青团决定任何实质性的东西。

同样，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，蒋介石在武汉也多次召集会议，讨论党团事宜。与会人数扩大到十余人，讨论的内容范围也扩大了，但康泽得到的印象是，关于三青团的讨论仍旧“不具体，且不集中”。康泽这种印象并不错。因为要具体且集中，就必须让各党派，特别是共产党，同意以三青团为各党派融合体。而当时从蒋介石本人起，国民党方面正在为此而努力，正在做大量的工作。

首先，1937年12月中旬，陈立夫与刚刚到达武汉的周恩来、王明谈判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、共同纲领等问题。蒋介石在会见周恩来等人时表示，“所谈极好，照此做去，前途是见好转”，¹⁵鼓励共产党一步一步地向国民党靠拢。其次，1938年2月，军委会政治部成立，蒋介石一再邀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，原第三党主席黄琪翔也被任为副部长，力图造成各党派领导人已担任国民政府军政要职



黄少谷（1901—1996），抗战时期曾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兼《扫荡报》总社社长，担任过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。

的局面，为合并各党派再铺下一块基石。第三，复兴社主持的军队报纸《扫荡报》掀起宣传运动，大肆鼓吹“一个领袖、一个主义、一个政党”，宣称“今天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”，为取消共产党、合并各党派制造舆论。

蒋介石则放弃了“国民革命同盟会”这最初的方案，直接向中共和各党派提出合并的要求。他多次向周恩来表示，“对各党派惟愿溶为一体”，“希望中国只有一个党”，¹⁶“认为两党存在，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”，“并说国民党可以改变名称，各党均取消而加入为一派，党内是可以有派的”。¹⁷陈立夫更是代表国民党，一直与共产党及其他党派谈判合并之事。康泽回忆说，有一次，陈立夫约康泽等人于周恩来、王明见面，并说，“今天我们约周恩来等，是谈各党派都解散，大家在三民主义和委员长领导之下，组织一个党的问题，已经酝酿了好多时间，我已经和他（们）分别谈过。各党派都表示得满好，周恩来为这个问题要回

陕北去开会”。¹⁸

陈立夫的讲话与蒋介石在南京关于建团的几次讲话，以及《扫荡报》所造的舆论，完全一致，即一个主义——三民主义，一个领袖——蒋介石，一个政党——这个党并不是国民党，而是一个新党，是蒋介石在南京时内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。但陈立夫在此没有讲明，因为新党名称需要各党派同意解散后，相互协商、一致同意才行；而且，陈立夫作为长期主持国民党党务工作的人，内心也未必会同意抛弃“国民党”这一名称。

蒋介石、国民党为组建一个新的大组织的活动，到1938年2月下旬才被迫告一段落。首先，中国共产党由毛泽东发表谈话，指出“这类借统一之名，企图

蒋介石为什么要成立三青团

消灭共产党的理论，实际上要使中国退回到国内团结、一致对外以前的悲惨局面”¹⁹，从而驳斥了“一个政党”的理论。同时，从延安返回武汉的周恩来明确拒绝了党派合并的要求。最后，“青年党和国社党的负责人表示，共产党不解散，他们也不解散”。²⁰

关于蒋介石打算成立一个新政党以统一各党派计划，蒋介石的“文胆”陈布雷在1939年夏天所写的一段回忆文字，有较高的可信度。他写道：1938年4月国民党“临时代表大会之前后，尚有一事宜补记者，即蒋公对于党派问题之态度，蒋公以为……若当此抗战而犹不能造成一个信仰，一个政党，一个意志，则暴日驱逐之后，内部思想斗争之排拒，仍伏争夺相杀之端，而眈眈旁伺者何止倭夷一国，又安保无第二次国际侵略之祸患。蒋公之理想，以为与其用政权力量抑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，不如融合其他党派于一个信仰——三民主义与一个组织之下，其为国家民族前途而努力。简言之，即化多党为一党，而后公政权于誓行革命主义之民众。顾犹虑其他党派（如中国青年〈党〉、国家社会党及中国共产党）以合并为嫌，不能使其党徒谅解，因之主张苟各党能赞成合并，则中国国民党可更改党名，或酌改组织，以泯吞并或降服之嫌猜。此种意见，于会前曾向各党派负责人坦白说明之，中国青年党表示可接受，国家社会党允可考虑，独中共负责人秦邦宪、王明等坚决拒绝，谓合作可，合并则不可，此议遂寝”。²¹

而康泽在其回忆中也谈到，他通过1938年2月中旬蒋介石召集的一次谈话中，“意识到，原来之所谓临时全国代表大会，是准备各党各派都参加的”，是一个合并各党派的统一大会，只是由于共产党及青年党、国社党最终不同意解散，才开成了国民党一家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。²²



陈布雷(1890—1948)，1927年任蒋介石私人秘书，深受蒋器重和信任，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、中央宣传部次长、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兼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、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。